

后燕退据龙城后政治之“反动”

李海叶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慕容鲜卑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重要的少数民族。她在中原建立的后燕为北魏所灭退据龙城后,政治呈现出明显的鲜卑化倾向,表现于政治势力的构成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这种汉化的“反动”与此前慕容鲜卑在中原建立政权时汉化的轨迹迥然不同。

关键词:后燕;龙城政权;胡汉分治;鲜卑化

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1)04-0011-07

慕容鲜卑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重要的少数民族。她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前、后燕政权对当时北方的民族形势及后来的北魏发生较大影响,为史界所关注。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后燕在北魏的军事进攻下分崩离析,慕容鲜卑对于中原地区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即将瓦解,一部分鲜卑贵族退保龙城,继续延续后燕国祚,至407年常乐冯氏篡权失其国。关于后燕退据龙城后的这段历史,研究者鲜有涉及,本文试作探析,以期对考察慕容鲜卑民族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而对研究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历程有所裨益。

为了深入考察后燕退据龙城后的政治势力及制度的变更,我们有必要对此前慕容氏政权的相关问题作一简单追溯。慕容氏本为辽东塞外的一弱小鲜卑部落,从慕容廆时期召集因永嘉之乱流落在辽东的汉人,其国势因而走向强大,逐步吞并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统一了辽东地区,并趁冉闵之乱入主中原,先后建立前燕、后燕政权,对十六国时期的历史产生较大影响。与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慕容氏从辽东崛起,走过了一条十分特殊的建国道路。保存下来的辽东时期官员封裕的上疏记载: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湊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1][2824]}

文中所谈到的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皆为慕容氏辽东时期所兼并的诸少数民族,双方处于强烈的敌对关系中,因此慕容氏立国依靠的是永嘉之乱后涌入辽东的中原汉士族,二者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构成辽东政权的核心统治力量,所兼并的诸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地位^[2]。这一建国道路对慕容氏之后在中原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前燕、后燕与同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政权表现出较强的汉化色彩,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①,此不赘言。

与政权结构、政治势力之组成相联系的另一问题就是胡汉分治问题。因资料匮乏,目前对诸燕胡汉分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燕中原时期。前燕辽东时期仍保持着鲜卑部落,因史籍有较明确的记载,为史界所共识。进入中原时期以后,学者普遍认为慕容氏已解散部落,不施行胡汉分治^②。淝水战后,慕容垂开展复国运动建立后燕,对于其胡汉分治问题尚无研究者涉及,但相关史籍尚未发现其重建鲜卑部落的记载。

以上是关于后燕退据龙城之前政权发展的简单历程。龙城地区为慕容氏的发祥地,具有浓厚的鲜卑风习。慕容氏南下后,这里仍为多种少数民族的生息之地。前秦时期龙城镇将苻洛反,“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新罗、休忍等诸国,并不从。”^{[1][2902]}鲜卑、乌丸皆未

收稿日期:2010-10-12

作者简介:李海叶,女,内蒙古乌海市人,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有统一政权,此处的“国”指少数民族的“部”甚明。此时前燕早已灭亡,而龙城地区仍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北燕主冯跋的先祖本为汉人,为西燕将领,在西燕灭亡后谪徙龙城,“既家昌黎,遂同夷俗”。^{[3][2126]}可见龙城地区的鲜卑化是非常浓厚的。当后燕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回归到这样具

有强烈胡风夷俗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其统治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主要围绕政权结构(政治势力之组成)和政治制度这两个问题探讨,敬请方家指教。

首先我们来考察后燕龙城时期政治势力的构成。见于史载的龙城政权的职官如表1:

表1 后燕退据龙城后的职官

官职	族属			
	鲜卑	族属不明者	汉人	
司徒	慕容元 ^{[4][3486]}			
侍中	慕容熙 ^{[4][3476]}	悦真 ^{[4][3472]}	孙勃 ^{[1][3103]}	
散骑常侍	余超 ^{[4][3491]}			
光禄大夫	卫驹 ^{[4][3556]}			
大宗正	宇文拔(隆安二年398年) ^{[4][3475]}			
尚书令	慕容根 ^{[4][3476]}	慕容元 ^{[4][3486]}	慕容渊 ^{[4][3534]}	
尚书左仆射	慕容根 ^{[4][3472]}	慕容熙 ^{[1][3105]}	张通 ^{[4][3476]}	
尚书右仆射	卫伦 ^{[4][3476]}		王滕 ^{[4][3534]}	韦璆 ^{[1][3107]}
尚书	段成 ^{[4][3486]}	卫伦 ^{[4][3472]}	刘木 ^{[1][3106]}	阳璆 ^{[1][3100]}
			丁信 ^{[1][3104]}	王滕 ^{[4][3472]}
				鲁恭 ^{[4][3472]}
中书监、令				阳哲 ^{[4][3472]}
				常忠 ^{[1][3100]}
秘书监			郎敷 ^{[1][3100]}	
中领军	慕容熙 ^{[1][3105]}	慕容提 ^{[4][3527]}	张通 ^{[4][3472]}	
	宇文拔 ^{[4][3530]}	慕容拔 ^{[4][3599]}		
中卫将军	卫双 ^{[4][3486]}	冯跋 ^{[1][3107]}		
左卫将军			张兴 ^{[1][3107]}	
前将军	卫双 ^{[4][3476]}	段玘 ^{[1][3104]}		
后将军			张豪 ^{[4][3476]}	
左将军	高和 ^{[4][3491]}	慕容国 ^{[1][3104]}		
右将军			张真 ^{[4][3476]}	
司隶校尉	慕容熙 ^{[4][3476]}		张显 ^{[1][3105]}	
卫尉	悦真 ^{[4][3556]}			
步兵校尉	马勒 ^{[4][3476]}		张佛 ^{[4][3527]}	
城门校尉	和翰 ^{[4][3486]}			
殿上将军	段瓌 ^{[1][3104]}		秦兴 ^{[1][3104]}	
侍御郎	冯素弗 ^{[4][3598]}			
杂号将军	慕容崇 ^{[4][3476]}	慕容拔 ^{[4][3527]}	张顺 ^{[4][3476]}	李旱 ^{[4][3476]}
	孟广平 ^{[1][3103]}			

续表 1

官职	族属		
	鲜卑	族属不明者	汉人
幽州刺史	慕容懿 ^{[1] [3106]}	慕容豪 ^{[4] [3476]}	留志 ^{[4] [3486]}
青州刺史	悦真 ^{[4] [3556]}		
并州刺史	卫驹 ^{[4] [3556]}		
平州刺史	慕容归 ^{[4] [3541]}		
营州刺史	仇尼倪 ^{[1] [3106]}		
冀州刺史		刘木 ^{[1] [3106]}	
昌黎尹		张顺 ^{[4] [3476]}	留忠 ^{[4] [3486]}
燕郡太守			高湖 ^{[3] [36]}
辽西太守			邵颜 ^{[4] [3586]}
			李朗 ^{[1] [3102]}
石城令	高和 ^{[1] [3105]}		
襄平令	段登 ^{[4] [3508]}		

据表 1 我们发现,后燕退据龙城后汉人出仕者较少,大量出任各种职官者为鲜卑族或族属不明者。除慕容氏本族外,我们对其他诸人之族属来源进行考述。先来看在长期的共存中已融入慕容鲜卑者。在其政权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慕容氏经历了两次大的部落扩张:前燕的辽东时期和淝水战后后燕的复国运动时期。前燕辽东时期的部落扩充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完成了对段部、宇文这两个最主要的鲜卑部落的兼并。宇文、段部鲜卑均为活动于辽西塞外的两个强大鲜卑部落,与慕容氏毗邻,“时宇文、段氏方强,数侵略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4] [2593]}。此后,慕容氏强大起来,段氏及宇文氏先后被吞并,其族群整体进入慕容氏,构成慕容鲜卑的重要势力,随之南下中原建立诸燕政权,几乎伴随了慕容氏整个政权的发展历程。表 1 中出现的段氏、宇文氏诸人即段氏、宇文鲜卑。第二,除以上两个大的鲜卑部族之外,慕容氏还兼并了这一地区若干散落的鲜卑部落。包括昌黎鲜卑悦氏,前燕有悦綰为尚书左仆射^{[4] [3211]},悦希为太宰司马^{[4] [3196]},悦明为青州司马^{[4] [3172]};昌黎鲜卑卫氏,后燕时期有昌黎鲜卑卫驹率众降垂^{[4] [3320]}。表 1 中出现的悦氏、卫氏诸人即为其族。表 1 中仇尼氏源出不详,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谓其为鲜卑化的其他少数民族^{[5] [64、69]};和氏,本鲜卑白部,故号素

和,后改为和氏^{[6] [78]}。他们加入慕容氏的经历不详,但皆为东部鲜卑,很可能也是慕容氏在辽东时期兼并的诸少数族部落。第三,除鲜卑族属外,辽东时期进入慕容部的还有另外一重要族系:扶余族系,主要包括扶余、高句丽等族^{[7] [28]}。长期以来,慕容氏与宇文、段部处于激烈的对峙中,向西发展之势遭到两部的遏制,于是试图向东扩张。285 年灭夫余,“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1] [2804]};346 年再灭夫余,“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1] [2826]}。东晋成帝咸康八年(342),慕容氏灭高句丽,“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4] [3051]}。因此慕容氏政权中有大量高句丽及扶余人,故前燕灭亡时,有“燕散骑侍郎余蔚帅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邺北门纳秦兵”^{[4] [3236]}。表 1 中的高氏^{[6] [270]}、孟氏^{[5] [162]}、马氏^{[5] [161]}、孙氏^{[5] [162]},当为高句丽姓氏;余氏^{[6] [269]}为扶余姓氏,当为辽东时期进入慕容氏的高句丽及扶余的后裔。另表 1 中有冯跋、冯素弗者,本长乐信都人,“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则为汉人之鲜卑化者。

以上为诸鲜卑姓氏者来源,此外,表 1 中尚有大量的族属不明者,有张氏、李氏、王氏、鲁氏、刘氏。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及陈连庆《东北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其中鲁氏为乌桓之常见姓氏^{[5] [145]};张氏^{[5] [149]}、王氏^{[5] [146]}、刘氏^{[5] [48]}等姓

氏,乌桓^{[5][16]}、屠各^{[5][30]}皆有之。那么,他们到底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呢?疑其为慕容氏复国运动时加入的诸少数民族。淝水战后前秦败亡,北方的统一局面被打乱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慕容垂孤身来到河北开展复国运动,开始了慕容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部落扩充,《通鉴》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记载:

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利乃诣乌桓张骥,说之曰“家主已举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让再拜曰“得旧主而奉之,敢不尽死!”于是农驱列人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裂襦裳为旗,使赵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余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4][3321]}

可见慕容垂在复国运动时吸纳了大量的乌桓与屠各。后燕建立后,他们成为慕容氏所依靠的重要统治力量。表1中出现的张氏、李氏、王氏、鲁氏、刘氏诸姓,疑即复国运动中所募得之乌桓、屠各之北上者。

后燕退据龙城之初,兰汗篡位,“有李旱、卫双、刘志、张豪、张真者……(兰汗之子)兰穆引为腹心”^{[4][3099]},慕容盛倚之复国,“并赐姓慕容氏”^{[4][3476]},卫双为昌黎鲜卑,李旱等与之并赐姓慕容氏,其已鲜卑化甚明。此后,“李旱自辽西还,闻(慕容)盛杀其将卫双,惧,弃军奔走”^{[1][3103]}。可见他们的关系甚为密切,疑其为复国运动中同时归附慕容垂的少数民族势力,张豪、张真为列人乌桓张让之属,刘忠为易阳乌桓刘大之属、李旱为列人屠各李白之属。

出仕北燕的张氏有多人。慕容盛即位后,以张通为中领军,不久又以“张豪为后将军……张顺为镇西将军、昌黎尹,张真为右将军,皆封公”^{[4][卷3476]}。疑张豪、张真、张顺、张真同族,家族势力多集中于京畿警卫系统。不久,“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谋叛,盛皆诛之”^{[1][3100]}。慕容豪即张豪,因赐姓慕容氏而称为慕容豪。他们同时谋反伏诛,很可能是同族连坐。另,《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曰朝鲜族有张氏^{[5][157]},鉴于龙城政权含有大量的朝鲜半岛的居民,表1中的张氏诸人亦有可能为朝鲜族属。

关于尚书刘木。复国运动时中“牙门刘木请

先攻越栅……木乃帅壮士四百腾栅而入,秦兵披靡,农督大众随之,大败秦兵,斩越,送首于垂。”^{[4][3323]}这是慕容农于列人募兵后不久进攻前秦军队的事情。刘木当为易阳乌桓刘大之属,为随慕容氏北上者。

关于尚书鲁恭。复国运动中有列人乌桓鲁利,疑鲁恭即其族。

关于丁信,为慕容盛时期太后丁氏之子侄,虽来源不详,不过陈连庆先生认为其为鲜卑化的少数民族人^{[5][66]}。

关于郎敷,《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引《后汉书南匈奴传》:“(南匈奴)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以郎氏为南匈奴姓氏^{[5][26]}。十六国时期的汉-前赵政权之统治者刘氏被称为屠各,即以匈奴五部而立国,此后,后赵灭前赵,屠各入其国。冉闵之乱后,慕容氏从辽东南下灭后赵,后赵政权下的屠各复为慕容氏所吸纳。因此,表1中的郎敷应当是屠各随慕容氏北上者。

关于留氏,《资治通鉴》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燕昌黎尹留忠谋反,诛。事连慕容根、段成。并收幽州刺史留志同诛”^{[4][3486]}。留忠谋反连及鲜卑贵族慕容氏、段氏诸人,可见他们彼此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或为鲜卑化的武人。

综上所述,后燕退据龙城后的政权融入大量的胡族势力,汉族官员所占比例甚微,这一政治特点不仅表现于政权结构的组成,而且深入地影响到现实的政治生活,表现为鲜卑化的武人操纵政权,致使皇权频繁变更、统治极其不稳定。后燕主慕容宝退据龙城之初,曾兴兵南下欲光复中原,“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众心之惮征役,遂作乱……杀乐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谊及宗室诸王”,欲立鲜卑贵族慕容崇,“长上阿交罗,段速骨之谋主也,以高阳王崇幼弱,更欲立农。崇亲信譙让、出力犍等闻之,丁酉,杀罗及农。速骨即为之诛让等。农故吏左卫将军宇文拔亡奔辽西……兰汗袭击速骨,并其党尽杀之。”^{[1][卷110,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其中,段速骨、段谊为段氏鲜卑;宇文拔为宇文鲜卑;关于兰氏的族属,《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兰氏为匈奴四姓之一,为匈奴贵种^{[8][2890]},《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兰氏为“国中名族”^{[9][2945]},而宇文氏为“南匈奴之远属”^{[3][2304]}。兰氏在慕容部中地位亦显重,但史籍对于其部族进入慕容部的经历全无记载,与其一般交待重要鲜卑人物的族姓

来源的惯例不同,因此判断兰氏为宇文部下的族姓,可能随宇文氏进入慕容部。又,《北朝胡姓考》以兰氏源于鲜卑乌洛兰部^{[6] (231)}。宋赤眉、阿交罗、出力犍、骧让族属不详,从其姓名来看,必为鲜卑化的胡人无疑。可见,后燕龙城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完全为鲜卑化的胡人所控制。此后龙城政权几次易主,慕容氏失其皇统,高氏、冯氏迭相为主,都是这种政治势力下的产物。如后燕主慕容熙被杀,高云被武将冯跋等推为燕主,“云自以无功德而为豪杰所推,常内怀惧,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委之以爪牙之任,赏赐月至数千万,衣食卧起皆与之同”^{[1] (3109)}。但终为其所杀,冯跋代立,是为北燕。张金龙先生对冯氏北燕政权进行研究认为,“基本继承了后燕的遗产,是一个鲜卑化的政权。在北燕(特指冯氏政权)最高统治集团中基本上没有河北和辽东地区的汉族士人……”^[10],可以说是十分切中要害的。

那么,这种鲜卑化的政治势力的构成是否会影响到其统治制度呢?下面,我们来考察后燕退据龙城后的胡汉统治形式。后燕鲜卑贵族的子余势力退至龙城之初发生火并,大将兰汗杀后燕主慕容宝自立,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3] (2069)}。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单于”之称号,本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最高称谓。那么,兰汗自称“大单于”是仅为空号还是确实统属北族部落、建立胡汉分治系统呢?匈奴汉国之胡汉分治为五胡十六国之滥觞,通过对其分治制度的分析,我们发现后燕的胡族部落系统基本仿袭匈奴汉国建置。

《晋书·刘聪载记》:“魏武分其(匈奴)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蓁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1] (2645)}匈奴汉政权藉此五部立国,五部之众成为“国人”,组成胡族系统之核心。此外“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1] (2665)}。以上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汉政权建立前后的胡汉分治系统。我们看到,匈奴汉政权建立前后的胡汉分治系统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以左右司隶统京畿附近的汉人;第二,以单于左右辅统本族以外的诸少数民族,即所谓的“六夷”;第三,本族民则分为左右南

北中等五部,以部帅统之,曹魏时一度改置都尉。这是匈奴汉政权的胡汉分治制度。

继兰汗称“大单于”之后,慕容盛杀兰汗重夺慕容氏皇权,“立燕台,统诸部杂夷”^{[4] (3516)}。胡三省注曰“二赵以来,皆立单于台以统杂夷,盛仍此立之。”则燕台即大单于台,是龙城政权用以统治诸杂夷的机构。至慕容熙“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位次尚书”^{[1] (3105)}。则单于台的设置进一步完善化,由单于左右辅负责具体事宜。此后冯跋取代了慕容氏的皇统,但是部落仍被保存下来,此项制度亦因袭未改。“燕王跋以太子永领大单于,置四辅。”^{[1] (3130)}则大单于台又增置二辅,其职能进一步复杂化。北燕四辅多可征于史籍,关于此,日本学者三崎良章已作考述^[11]。

对于本部民,后燕龙城政权亦分为左、右、南、北、中等五部进行统治,这也与匈奴汉国的统治方式相同。《太平御览》引范亨《燕书》载“昭文帝(慕容熙)时左部民得紫璧以献”^{[12] (3584)},同书引高闾《燕志》:“(冯跋)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于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苟妻产妖,旁人莫觉,俄而失之,及暴苟妻于社,大雨普落。”^{[12] (55)}《别本十六国春秋》记载“太平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赵寿女既嫁化为男。”^③则左部、右部、北部皆可征于史,其与匈奴本部民的五部何其相似。《冯跋载记》:冯跋发动政变,“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室,遂杀熙,立高云为主”^{[1] (3127)}。冯跋小字乞直伐,孙护之弟叱支乙拔^{[4] (3683)},皆已鲜卑化。大概后燕龙城政权设司马管理鲜卑部众,如同魏武设都尉管理匈奴五部。

后燕龙城政权都城汉人则由司隶治理。《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慕容熙)即皇帝位,大赦,改长乐三年为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进州郡及单于八部耆旧于东宫,问以疾苦。司隶部民刘瓚对问称旨,拜带方太守。”^{[12] (607)}刘瓚被拜为带方太守,以汉人出任汉式地方官。据表1可知后燕龙城政权从州刺史到郡太守已建立一完整的地方职官系统,故司隶管理的应该是京畿之汉人,故慕容熙可便宜召之东宫。

表1显示从中央尚书省到地方的州郡县,后燕龙城时期业已建立一套完整的汉式职官政府,同时建立大单于台和单于左右辅等职官统治本族和其他杂夷,从而确立了胡汉分治的二元体系。

胡汉分治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十分重要和突出

的民族问题,关于其具体形式,近年来学术界多有争议。传统看法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其他诸少数民族共同构成胡官之大单于系统,而汉人则属于汉式职官系统,是为胡汉分治^④。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汉赵国单于台仅仅统辖屠各本族之外的杂胡,而屠各本族由宗室诸王直接统辖,汉族民户为其军户,后者共同构成单于台之外的又一军政机构,由此形成了胡汉分治下的“胡胡分治”^[13]。我们看到,学术界关于胡汉分治形式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本族之外的杂夷的归属上。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考证龙城时期后燕政权慕容氏之外的杂夷的构成及统辖形式。但是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发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郡县建立一整套汉式职官系统的同时,仿效十六国时期的匈奴刘氏政权,设立大单于之职,并以五部的形式来统治慕容氏和其他诸胡,形成与汉式职官系统相并立的另一胡族职官系统,是为胡汉分治之要旨,故后燕龙城政权施行胡汉分治当无疑义。

综上所述,后燕龙城时期统治集团融入大量慕容氏之外的少数民族,汉族官员业已退出核心统治集团,同时确立了胡汉分治的统治体制。其无论是政权结构还是政治制度都与中原时期的统治有着较大的不同,表现出较浓厚的鲜卑化倾向。纵观慕容氏的政权建设和民族融合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前文已述,与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慕容氏走过了一条十分特殊的建国道路。慕容氏最初崛起于辽东,史称“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略廆,廆卑辞厚币以抚之。”^{[4] 2593}。而且二部数度发起战争欲攻灭慕容部而分其地。可见慕容氏早期的生存面临着重大危机,在被周边强邻孤立敌对的情况下,寻求外来合作力量是唯一的出路。此后慕容氏依靠永嘉之乱后涌入辽东的中原士族而强大起来,逐渐吞并了周边的其他少数部族,统一了辽东地区。因历史上的敌对关系,慕容氏仍与被兼并的诸少数民族保持着强烈的敌对关系,中原士族及辽东士人成为慕容氏之外最重要的统治势力,形成了辽东政权十分特殊的政权结构:慕容氏和汉士族分别把持着胡、汉职官系统,绝少有慕容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出任,汉士族为慕容氏之外最重要的权力阶层,而其他诸胡处于政治的底层。在这样的政权结构和部族背景下,前燕辽东政权培

育了一大批根基深厚的汉士族,其中因地缘关系,尤以河北士族为胜。包括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太原王氏、平原刘氏、清河张氏、清河傅氏、渤海封氏、渤海高氏、辽东李氏、阳平路氏诸家族,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对此已述,此不赘言^[14]。此后随着慕容氏统治重心的南移,双方的政治结合更为紧密。慕容氏初入中原,是为前燕,建都邺城,以华北为统治重心、冀州为其核心,需依恃冀州士族进行统治;淝水战后,慕容垂在河北开展复国运动,建立后燕,最终定都中山,仍以冀州为统治重心,同样在政权格局上也延续了前燕的模式:仍以冀州士人为核心统治阶层。此后,他们又从后燕仕宦于北魏,对北魏初年的政治建置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魏书》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可以说,汉士族与五燕政权在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是历史的现实的双重原因所造成的。这也使得与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慕容氏政权具有强烈汉化倾向,并因此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可以说,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治的结合及给予它的影响贯穿十六国慕容氏政权始末,是其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但同时,为治史者所忽略的另一条主线隐现于慕容氏政权的发展历程。慕容氏从辽东南下在中原建立政权,其统治形势发生变化,其统治者努力维系着政权的民族性。在这种情况下,本族的力量进一步强化,逐渐融入慕容氏的其他诸胡的政治势力日益涌起、入仕慕容氏政权,占据了某些政治上的中枢位置,与此同时,汉士族的地位与影响力日渐式微,不复昌黎时期^[2]。前燕亡后,淝水战后慕容垂在河北地区开展复国运动吸纳了大量乌桓、屠各等少数民族部落,不久,西燕灭亡,其所集结的西迁之慕容鲜卑又被重新纳入后燕统治下,后燕的最高统治者乃自称皇帝,以太子为“大单于”,重建胡汉分治的二元体系,前燕中原时期业已消失的胡汉分治重现于后燕政权。与此同时,复国运动时归附的少数民族和前燕辽东以来所兼并的少数民族大量入仕后燕、占据着核心统治地位,已取代华北士族成为慕容氏之外的最重要的统治力量。如果沿着这条脉络追溯,我们看到,后燕退据龙城后的鲜卑化倾向亦是政治发展的必然,并在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得以实现。当然,不仅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关乎龙城之特殊的地理民族的环境,而且与长期以来宗室内部的斗争、后燕复国运动的道路息息相关,因

篇幅所限,笔者当另撰文论之。总之,慕容鲜卑的民族发展历程所揭示的深层问题却是发人深省的。五胡十六国是秦汉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开启“五胡乱华”之局面的重要历史时刻^⑤,慕容氏及其所建的诸燕政权常被史家视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汉化历程的典型代表。但我们发现当后燕在中原的统治瓦解退据龙城后,又重新发育成一个鲜卑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累积了数年的汉化成果也付之东流,此后为北魏所灭,成为代北鲜卑的一部分,最后由北魏进入隋唐,至此才完全融入中原民族,其汉化也因此经历了一个艰难回环的过程。这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

注释:

①参考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1989年)、刘国石《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要瑞芬《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邹洪礼《论中原士大夫对前燕慕容氏封建化的影响》(《新疆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4卷)等文章。

②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06页(安徽黄山书社,1987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0页(上海三联书店,1962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38、245、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第172、173、17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

③崔鸿《别本十六国春秋》,第85页,丛书集成初编本。关于《别本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参考刘琳《明清几种〈十六国春秋〉之研究》,《北朝研究》1995年第4期。

④参考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第110页(安徽黄山书社,1987年)、周一良《乞活考》,第28页(《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国际汉民族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李志敏《“汉族”名号起源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第106页~107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

参考文献

-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李海叶.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5]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7]金毓黼.东北通史[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张金龙.北燕政治史四题[J].南都学坛,1997(4).
- [11]三崎良章.北燕の鮮卑化について[J].日本: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研究纪要(21),2003.
- [12]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3]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J].民族研究,2009(3).
- [14]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A].袁行霈.国学研究:第4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于默颖】

The Political “Reaction” of Later Yan after Its Retreating to Long City

LI Hai-ye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ics of Murong Xianbei tribe in the period residing in Long City after later Yan present strong Xianbei tendency, in the formats of 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forc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e reactionary in localization shows very strong contrasts to the localization of its previously-established regime in Center Plain.

Key words: Later Yan; Long City Regime; Separated Regime between Barbarian and Han; Xianbei tendency